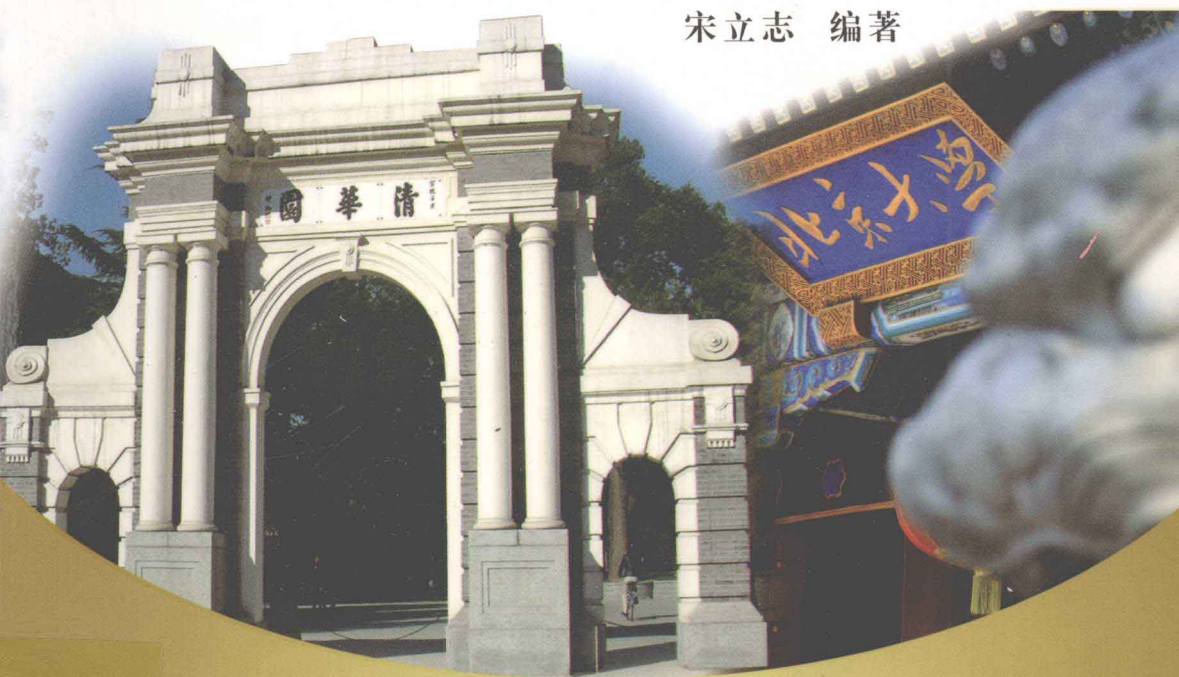


名校精英

MINGXIAO JINGYING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宋立志 编著



本书介绍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奋刻苦、聪明智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为推进世界科学技术进程作出卓越的贡献。

京华出版社

名校精英

MINGXIAO JINGYING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宋立志 编著



本书介绍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奋刻苦、聪明智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为推进世界科学技术进程作出卓越的贡献。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 宋立志编著.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0. 7
(名校精英)

ISBN 978-7-80724-934-4

I. ①清… II. ①宋… III. ①清华大学—概况②北京大学—概况
IV. ①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8646 号

名校精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编 著 宋立志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 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 (发行部)

(010) 64259577 (邮购、零售)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 印张

印 数 1—5000

出版日期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934-4

定 价 298.00 元 (全 10 册)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简介	(3)
梁 思 成	(6)
华 罗 庚	(13)
袁 复 礼	(21)
冀 朝 鼎	(25)
杨 武 之	(30)
张 子 高	(35)
裘 维 蕃	(42)
赵 忠 尧	(45)
潘 光 旦	(50)
钱 伟 长	(61)
陈 桢	(77)
陈 克 恢	(84)
何 泽 慧	(89)
萨 本 栋	(96)
吴 仲 华	(101)
吕 保 维	(110)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简介	(119)
丁 国 瑜	(121)
侯 仁 之	(125)
周 秀 骥	(130)
谭 其 骧	(134)
李 汝 祺	(137)
吴 瞿 安	(141)



吴全德	(145)
张竞生	(149)
张炳熹	(157)
马衡	(160)
蒋丙然	(165)
许杰	(170)
贾福海	(173)
卢衍豪	(177)
胡世华	(181)
刘光鼎	(184)
钟家庆	(188)
刘兴洲	(193)
王普	(199)
沈绪榜	(202)
林宗扬	(207)
梁晋才	(212)
傅鹰	(217)
蒋明谦	(222)
赵匡华	(226)
徐光宪	(231)

清
华
大
学



清华大学简介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中国综合性大学,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 始建于 1911 年, 1912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1925 年设立大学部, 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 同年开办研究院 (国学门), 1928 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并于 1929 年秋开办研究院, 各系设研究所。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南迁长沙, 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 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 年迁至昆明, 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 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 设有文、法、理、工、农等 5 个学院, 26 个系。



清华大学

1952 年,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 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1978 年以来, 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逐步恢复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 并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1999 年,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 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211 工程”建设和“985 计划”的实施, 清华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开发以及整体办学条件方面均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 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工 7800 余人,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34 名、中国工程院院



士 26 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100 余人。全国重点学科 49 个;本科专业 5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159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12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7 个。在校全日制学生 27000 余名,其中本科生 13000 余名,硕士生 8600 余名,博士生 4600 余名。有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及进修生 1300 余名,远程教育学员 7500 余名。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1 个,国家专业实验室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4 个、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 个、科技部重点实验室 1 个、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 6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 个,教育部网上研究中心 6 个。学校藏书 400 余万册。学校占地面积 400 余公顷,建筑面积 230 余万平方米。出版物有《清华大学学报》(分自然科学版、英文版、哲学社会科学版)、《世界建筑》、《装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

清华大学治学严谨,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清华大学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 11 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治学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他们中有竺可桢、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叶企荪、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孙、钱钟书、费孝通、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马寅初、陈寅恪、熊庆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斗等是清华的进修生和资助生,美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是清华校友。在 1999 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 23 位功勋中,有 14 位是清华校友。截至 2001 年 12 月底,1537 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 25% 为清华大学校友。

水清木华九十余载,清华大学蕴育着独特的精神魅力。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学校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精神。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从建校初期就成为清华师生治学与为人的追求,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从“五四”爱国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从施混清混、韦杰三到闻一多、朱自清,生动地展现了清华师生的革命精神。解放后,清华大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培育“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探索出一条“爱国、成才、奉献”和“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成才道路。今天,她更以“拼搏、创新”的精神,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清芬挺秀,华夏增辉。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的清华人继承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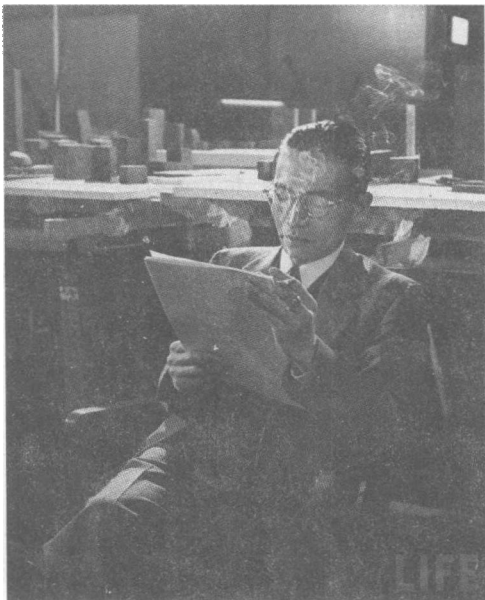


- 1911 年 建立“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
- 1925 年 设立大学部
- 1928 年 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
- 1937 年 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 1938 年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
- 1946 年 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 1952 年 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 1978 年 恢复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考试
- 1984 年 设立国内高校中第一个研究生院
在管理工程系基础上建立经济管理学院
在已有理学科系基础上恢复理学院
- 1985 年 建立国内第一个继续教育学院
- 1988 年 在建筑系基础上建立建筑学院
- 1993 年 在已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 1994 年 在已有信息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 1996 年 在已有机械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机械工程学院
- 1999 年 恢复建立法学院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2000 年 在已有土木水利类学科系、所基础上建立土木水利学院
在公共管理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共管理学院
- 2001 年 建立医学院
- 2002 年 在传播系基础上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 2004 年 在工程力学系、宇航技术研究中心等基础上建立航天航空学院

梁 思 成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建筑学、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

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出生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父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迫流亡日本。在家庭的影响下,梁思成自幼怀有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和赤诚的爱国之心。他在日本生活了10年,曾就读于一所华侨小学。10岁时随家人返回祖国。先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4岁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学学习。在“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宣传活动,是清华爱国学生组织“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在清华的8年学习中,他不但成绩优秀,而且业余爱好广泛,表现出多方面的才华,特别是文学、美术、音乐,曾任1922-1923年《清华年报》的美术编辑;清华管弦乐队第一任队长。在清华学校的良好教育和父亲渊博学识的影响下,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对中国文化已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感情。



梁思成

1923年,梁思成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攻读建筑学,在学期间,他学业出众。先后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据他的同窗好友、著名建筑师陈植回忆:“思成兄在建筑设计方面鲜落窠臼,成绩斐然,几次被评为一级。”他的设计被编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作业选》一书。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有各国古代文物,如青铜器、陶瓷、雕刻等,梁思成经常去临摹展品、查阅文献。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更加浓厚。1925年他收到了父亲赠与的新版《营造法式》,惊喜万分。但一想到对于祖国丰富的建筑遗产,国内研究者却寥寥无几,便产生了一种使命感,于是逐步树立了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志向。结束在宾夕法



尼亚大学的学习后,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建筑和雕刻的研究情况,他又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3个月。

1928年3月,梁思成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的林徽因女士结婚,同年夏天一起回国。

梁思成于1928-1930年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1931-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1933-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1972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1946-1947年任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顾问团中国代表,同时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9-1955年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3-1972年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和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树丰碑的建筑史学家

自“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留学归国的建筑学家不满足抄袭西方建筑模式,他们在自己的建筑创作中力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建筑文化传统,以此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例如当时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海中国银行,便是这种思潮的反映。而梁思成则是这种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1931年夏,梁思成应朱启钤先生之邀,到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当时在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完全是一片空白。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寻找古代建筑遗存开始的。梁思成提出的研究方针是“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他说:“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研究;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而言,尤须重‘一见’。读跋千篇不如得见原画一瞥。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庭。”从1931-1945年,他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调查了15省200余县的2000余个古建单位。他们首次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一些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分析、研究。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个时代的古代建筑遗存,建立起一套包括图纸和照片的档案,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例如关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遗构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关于中国最古老的,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敞肩券拱桥的“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关于中国最古老的木楼阁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以及有关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最古老最高的木构高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考察报告等。这些人类重要文化遗产是梁思成首次发现并给予科学评介,公诸于世的。

与此同时,梁思成还对中国古代建筑典籍,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宋《营造法式》进行了研究、整理。但是,一开始,面对那些文字晦涩难解,夹杂若干已经失传的工匠术语的古文献,无从下手。他只好拜老木匠、彩画匠为师,并结合现存实



物,由近及远,由清代追溯到宋代。他在1932年所写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中,第一次对中国清代建筑的“文法”进行了解剖。紧接着,又着手研究《营造法式》。但是了解宋代建筑的老师傅是没有的,宋代建筑的实物也有待于去寻找。他曾说:“公元1932年春,我第一次出去寻找,……(在)明清建筑中所没有而《法式》中言之凿凿的,在这里(指蓟县独乐寺)却第一次看到,顿然‘开了窍’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环境和财力的变化,已无法再进行长途跋涉,到各地去进行古建调查和测绘。于是,他在对已掌握的40余座殿堂和几十座砖塔深入研究和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宋《营造法式》初步整理、注释的基础上,首次将处于混沌中的古代建筑遗物,从结构体系、造型特点、装饰雕刻手法、色彩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阐明了中国建筑发展的来龙去脉,总结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评述了中国建筑发展的辉煌成就。1943年写出了第一部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中国建筑史》书稿(1985年编入《梁思成文集》第三卷出版)。1946年他第一次用英文写成《中国建筑史图释》(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一书(因种种原因,该书于198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使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瑰宝,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文献[1]序)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对此曾作如下评论:“他以英文写成这本书,就是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在外国人看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中的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对《营造法式》一书的研究工作,因战后复员、迁徙而停顿下来,直到1961年,才又重新开始。1966年初,终于将《营造法式注释》一书的文字工作全部完成。由于十年动乱,他的这部耗费了毕生心血的巨著,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问世。这部巨著连同他在中国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诸方面的研究成果,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梁思成不仅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还是文物建筑保护学科的倡导者。这门学科是从19世纪中叶在欧洲开始兴起的,直到1964年才制定出第一部世界公认的权威性规范,即《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梁思成早在战乱的40年代就曾为保护文物建筑而奔走、呼号。例如1944年夏,他曾出任当时教育部所属的战区文物建筑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当盟军即将大反攻时,他编辑了中国古城、古建、古迹的保护名单。同时,还把他知道的日本京都、奈良等重要文物建筑也附在上面,并把保护目标标在军用地图上,提供有关方面,致使若干重要文物建筑得以免遭战火袭击。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与他联系,希望他能给解放军提供一份全国文物建筑保护名单。当时他非常感动地说:“想不到共产党如此珍视文物保护,竟作了原来自己一直担心而又不肯奢求的大事。”于是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日以继夜地赶编出第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简目”,这个材料曾印发给解放军各作战部队。他又一次为保护



文物建筑做出了贡献。

梁思成提出的许多保护文物建筑的观点是科学而全面的,与《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不谋而合。例如他曾写道:“无论那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正是《威尼斯宪章》中关于文物建筑是历史信息载体的概念。又如,他提出:“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他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他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这正是《威尼斯宪章》中所倡导的“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境”的观点。解放以后,在对待北京城的建设问题上,他也曾明确地指出过:“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因此,他呼吁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城楼,因为“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

梁思成在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的另一功绩在于冲破传统的保护观念,提出了新的保护原则。1935年他在“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中第一个提出:重修文物建筑不同于古代匠师们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料坚实的殿宇……,使之面目焕然一新的作法;而应“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1964年他又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在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中,一般应以‘整旧如旧’作为我们的原则。”对于“风烛残年”危在旦夕的古建筑,应采取“输血打针”的办法使其恢复健康,“老当益壮”,而不是涂脂抹粉,使其“反老还童”。他还指出文物建筑应具有“与它的高龄相适应的‘面貌’,表现他特有的‘品格’与‘个性’”。他的这些观点,成为60年代以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共同遵守的指导性原则。梁思成有关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观点,在《威尼斯宪章》被介绍到我国之后的80年代,更显现出其夺目的光彩。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建筑设计本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也曾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设计。例如他曾领导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完成了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的扬州鉴真纪念堂设计。解放初他还曾领导过清华大学营建系(即后来的建筑系)师生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同时,他对我国当代的建筑创新和城市规划也一直非常关心,并作过若干理论性探讨。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提出过许多规划方案和建议。在他的晚年还曾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了“拙匠随笔”的专栏。撰写的文章涉及到“建筑的艺术性”、“建筑的民族性”、“传统与革新”、“美观和实用、经济、坚固的关系”,建筑与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美学的关系等重要建筑理论问题,在我国建筑界曾引起很大反响,对繁荣建筑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梁思成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他曾先后两次创办建筑系。1928年,他刚



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便在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该系与同年在南京创办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建筑方面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吸引了大批北方学生就读。1931年因发生“九·一八”事变被迫停办。然而,由于他的办学方针正确,师资力量雄厚,在短短的三年中却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至今仍活跃在我国的建设战线上。抗日战争结束后梁思成回到北平,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初名营建系),担任系主任、教授。他广纳各种人才,邀请了一批学术造诣高深的教师来校任教,被誉为具有“广延名师,融通百学”的风度。他所选拔的每位职员或工人,也都各具专长。当时建筑系教职工的人数虽不多,但个个精悍,人人称职,使清华建筑系办得颇有特色,成为国内建筑教育界的后起之秀。在教学计划中体现出一种重视人文科学、环境科学和文化修养的建筑教育体系,几十年来已为祖国培养出大批建设人才,许多人成为我国建筑事业的中坚力量。

在清华建筑系,梁思成曾亲自开设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国绘塑史、设计原理等多门课程。他以渊博的学识,对建筑专业真挚的感情,对祖国建设事业的献身精神感染着学生。他授课语言生动。形象丰富,旁证博引,妙趣横生。大家都很钦佩他的讲课技巧,尤为赞叹他在黑板上随手勾画的建筑图像。但他说:“你们别看我在黑板上画得这样熟练,我在讲课前要默画好多次呢!”

梁思成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全面文化素养。他认为:“只有尽一切努力把学生的素养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趣味才能上得去,如果只顾练‘技巧’,其作品必多‘匠气’,而少‘灵气’与‘内涵’。”他还认为:“有思想理论的人洞察力敏锐,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你却能捕捉到。”在课下,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不管年龄、身分的差别,总是与人谈笑风生。学生们在他面前不感到拘谨,在与他闲谈之中能得到许多教诲。他曾谈到:“不要轻视聊天,……学术上的聊天可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成熟的。……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

梁思成总是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待他的学生和助手,常常为他们批改习作文章,审阅试作教案,一起讨论或耐心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当他发现助手们提出的看法有一点可取之处时,便给予肯定和扶植,引导他们继续钻研。对他们所取得的一些微小成果都给予鼓励,并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申明,是助手们独立地解决了某一个他几十年研究中未曾解决的问题,感到非常高兴。他把助手与他的关系称为“青老结合,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集体”。对年轻一代充满了信任和挚爱。

梁思成在建筑领域和教育事业中功勋卓著,成就辉煌。然而,他那每一项成果的取得,都是来之不易的。



30年代,为了寻找那些珍贵的古建遗存,他经常要到远离城市的荒僻山野,去作科学考察。因去处荒凉,往往搭不上火车,只能乘蜗牛般的长途汽车、骡车,甚至骑驮骡。有时找不到旅店就住在寺庙里,吃窝头咸菜,他还风趣地称之为“斋戒”。而当他找到一幢优秀的古建筑时,“咨嗟惊喜”,一切艰苦便都置之度外了。例如在考察佛光寺大殿时,为了弄清这座建筑的年代,钻屋顶,爬梁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到的痛苦,他在记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梁架上部结构都被顶板隐藏,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集在上面,无法驱赶。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像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人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后来,他们发现殿内露明的梁底面,隐约有墨迹,但被刷上了一层土红色,难以辨认。为了看清楚那些字迹,又费了三天时间,搭架子清洗,最后终于取得了建筑建造年代之证据。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物质条件更为艰苦外,他还遭受着病魔的折磨。在迁往后方时正患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为了支撑脊骨,他在衬衣内穿上了铁架子式的“背心”,迁徙的路上,又得了关节炎,“约有一年时间,他的背痛得厉害,不能在床上平卧,后来就日夜半坐在一张帆布椅上”。1940年到达四川,住的是低矮、阴暗、潮湿的陋室。入川不到一个月,夫人林徽因肺结核病复发,卧床不起。这时他“由于背的毛病,头已重得抬不起来了,画图时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他的夫人为了协助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在病床上仍在查阅中、外文书籍。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探索着。梁思成这种献身事业的伟大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梁思成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一位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和气节。

“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他和林徽因由于处理营造学社的资料,拖延了去后方的时间,这时……忽然收到了“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为了不背叛祖国,又能避免遭到敌人的毒手,第二天全家只带了些简单衣物,丢下大批贵重物品,便匆匆离开了北平,到西南后方去了。”

1938年,他的脊椎病复发,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写信来邀请他去访问讲学,有些美国朋友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到美国去治病。但他不愿意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离开自己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他认为自己应该同全国人民一起坚持抗战到底,所以谢绝未去。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美国讲学,当时正是北平解放的前一年,有不少人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还是留在美国吧。”并劝他把全家接到美国去。他当时虽然对共产党没有多少了解,却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建设出力吧!”

在十年动乱中,梁思成受到了批判、摧残,不久便病倒了。在他一生最后的日子,所想到的仍然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说:“夜间,我看着他独自一人默默地同死搏斗;坐起来,躺下去,又坐起来……,他却突然对我说话了,气息十分微弱,讲每一个字都很吃力:‘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就这样,梁思成离我们而去了,但却把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留在了人间。